

汉画“攫盗女”图补说

——芦山樊敏阙“龙生十子”图辨误

唐长寿 (乐山市文化局)

摘要: 芦山樊敏阙所谓“龙生十子”图, 定名不妥。本文作者考察发现该图实为两个不同的题材, 左面为“仙界宴饮图”, 右面为“攫盗女”。

关键词: 樊敏阙; “攫盗女”图

中图分类号: K879.4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6962(2009)02-0051-02

《四川文物》2005年6期发表了拙作“新津画像崖棺‘攫盗女’图考”一文。笔者考证定名为“攫盗女”图, 认为应是一幅表现妇人和猿的鬼神传说故事。后读芦山樊敏阙“龙生十子”图, 发觉该图与“攫盗女”图相似。

该图是芦山樊敏阙上有一幅著名的画像, 画像“正面刻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, 树下衣冠而坐者六人(应为五人), 其右侧山峦重迭, 有四人作登山状, 转角处蹲一大象”^[1]。此图自邓少琴先生释为“龙生十子图”来, 学术界多沿用其说。其考释所据文献为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, “哀牢夷者, 其先有妇人名沙壹, 居于牢山。尝捕鱼水中, 触沈木若有感, 因怀妊, 十月产子男十人。后沈木化为龙, 出水上。沙壹忽闻龙语曰:‘若为我生子, 今悉何在?’九子见龙惊走, 独小子不能去, 背龙而坐, 龙因舐之。其母鸟语, 谓背为九, 谓坐为隆, 因名子曰九隆。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, 遂共推以为王”。

然而, 笔者以文图相对, 实难相合。2005年7月, 笔者实地考察, 发现该图实为两个不同的题材, 左面以大树为中心的五人应是“仙界宴

饮图”(乐山崖墓柿子湾一号墓有类似的“宴饮图”); 右面所谓“四人作登山状”图则与闻宥《四川汉代画像选集》中所录新津崖墓画像石棺“戏猿”图相同(图一、图二)^[2]。



图二 新津崖墓画像石棺“戏猿”图拓片二

最近近笔者从台湾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》中见到一幅“新津石函画十一”^[3]图(图三), 该拓片只有右面部



图三 “新津石函画十一”

分图像, 画一“猿”和一妇女坐于山洞中, 各自形态特征异常明显, 山形也更为突出。显然又是一幅相同题材的是“攫盗女”画像。据巫鸿先生研究, 除上述的新津石棺上的两幅外, 在乐山3号崖墓(笔者最近已找到该墓, 位于柿子湾内)



图一 新津崖墓画像石棺“戏猿”图拓片一

和内江石棺上也各发现一幅“覆盗女”图(图四、图五)。即表现“猿精劫持妇女”主题^[4]。在成都民间收藏的摇钱树座上也有“覆盗女”陶



图四 乐山柿子湾崖墓“覆盗女”拓片



图五 内江石棺“覆盗女”拓片

塑。证明该图在汉代蜀地之普遍，诚如巫鸿所言：“白猿传确实是成都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画像主题，在汉代为当地人们所习见”^[5]。

樊敏阙此图图像虽然模糊一些，细察该图像表现既非“戏猿”，更不是“龙生十子”图。而是汉代蜀地习见的“覆盗女”图。

注释：

[1] 重庆市博物馆：《四川汉代石阙》，文物出版社1992年。

[2] 闻有：《四川汉代画像选集》，群联出版社1955年。

[3] 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》，民国九十一年出版。

[4][5] 巫鸿：《汉代艺术中的“白猿传”画像》，郑岩、王睿编《礼仪中的美术》，三联书店2005年7月。

(上接21页)

的呢？上述引文中的第6条非常值得注意，即高僧“释僧晃”的生平。“释僧晃”于北周保定年间(561~565年)到长安，跟随北周长安大福田寺高僧^[14]“昙相禅师”学习心法。北周武帝遇灭佛被困长安。北周末~隋初佛教复兴后回到故乡绵州。隋开皇、仁寿年间均在“振响寺”主持佛法，至武德年去世。由此看来，虽然我们暂无法肯定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，但至少可以说明“开元寺石佛”很有可能是诸如“释僧晃”此类南北游学的僧人从长安回到绵州时一并请来“振响寺”的北周晚期~隋代的长安造像，或是由僧人们在北周末~隋代回到绵州时带来的长安工匠在绵州当地制作的。

(附：感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先生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先生、日本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先生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。)

领队：于春

参加调查人员：于春、王婷、卢丁、钟治、李生、王静、杨红武、毕瑞、罗春晓、师若予。

手工绘图：于春、王婷、曾玲玲

执笔：于春、王锡鉴

注释：

[1] 本文所言之左右均指造像本身之左右。

[2] 李淦：《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》，中华书局，2002年，第192页。

[3] 袁曙光：《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第10期。

[4] 虽一般认为皇泽寺28号大佛窟是初唐时期的作品，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开凿于隋代。

[5] 袁曙光：《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》，《文物》1992年第2期。

[6] 雷玉华、李裕群等：《四川汶川出土南朝佛教石造像》，《文物》2007年第6期。

[7]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98年第11期。

[8] 张肖马、雷玉华：《成都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第10期。

[9] 1950年西安南郊塔坡清凉寺出土。

[10] 1983年西安南郊空军通讯学院出土。

[11] 这批造像的资料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出版。除现场观察外，还可以参照冯贺军：《曲阳白石造像研究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5年出版；杨伯达《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》，载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60年；王丽敏从、吕兴娟：《河北曲阳县出土石造像》，载《文物春秋》2002年06期等。

[12] 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美术史学系肥田路美先生所授。

[13]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先生所授。

[14] 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《续高僧传》卷第十六《周京师大福田寺释昙相传十八》载。